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453

# 建国初期劳动教育的兴起与上海的地方性实践

刘亚娟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1949年后,中国中小学教育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教育部门妥善处理了“1953年升学危机”。危机过后,教训变为经验。小学、初中教育在“过剩”与“发展”的矛盾中继续前行,毕业生的持续过剩推动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上海地方,劳动教育与宣传动员的范围均在逐步扩大,而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也步入常态化。

**关键词:** 建国初期; 上海市教育局; 1953年升学危机;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8)04-0167-06

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劳动教育”不仅是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949年之后形塑“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举措。劳动教育贯穿了现当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始终并延续至今,也因之成为教育史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关于这一教育制度的兴起过程,散见于教育史与党史的学术著作中。在有限的专门研究中,劳动教育多被化约为教育理念,并沿着制度路径被呈现出来<sup>[1-4]</sup>。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劳动教育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贯彻并常态化,与整个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劳动教育”不仅需要理论溯源,也应在实践层面得到充分还原。有鉴于此,本文将上海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置于建国初期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这一教育制度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过程进行微观的历史性考察。

## 一、从理念到实践:1953年升学危机应对

建国之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延续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主要内涵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sup>[5]</sup>。在吸收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目标<sup>[6]</sup>。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构)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工农干部学校、技术学校、业余学校纳入学校系统中<sup>[7]</sup>。同年,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使高小、初中毕业生除升学、就业外,尽可能进入各类艺徒学校、技术学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要求<sup>[8]93</sup>。

与之相适应,在继承中国近代劳动教育理念、吸收苏联劳动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劳动教育亦伴随着国家教育制度的完善而轮廓逐渐清晰。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并在全国试行。规程将“爱劳动”提升到“国民公德”的层面,要求教师“根据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实际”进行教学,自然科学的教学则强调要结合现代生产技术,使学生了解生产的基本过程与生产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sup>[8]139</sup>。这一规程明确了劳动教育在“道德”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内涵,从而率先在中学教育中将劳动教育文本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初步完成了顶层设计,教育事业在两条路径上推进:一方面,在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等教育的规划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教育大发展;另一方面,在学校教育中有意识地增加“技术”因素,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更多技术人才。作为上述思路的直接反映,中国教育事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受限于师资等客观条件,教育事业也逐渐明显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到了1952年下半年,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除了职业技术教育“跟不上国家建设的需要”外<sup>[8]240</sup>,还突出表现在小学、初中发展迅速,而高中则相对滞后(如图1<sup>[9]1001,1021</sup>所示)。

收稿日期: 2017-12-24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高层次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资助(2017ECNU-HLYT010)

作者简介: 刘亚娟(198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E-mail:yjliu@dlps.ecnu.edu.cn

从1953年3月起,教育部根据“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基本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并于当年暑期毕业前夕压缩了初中、小学的招生比例,但突如其来的招生紧缩又引发了连锁反映,导致当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學生,特别是高小毕业生激增<sup>[8]239[9]983,1001,1021</sup>。

上海市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被视为全国教育布局的一个缩影。1949—1952年全市在校小学生增加了83%,中学生增加了76%<sup>[10]</sup>。1953年4月,根据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示,上海市教育局重申了必须坚决纠正教育事业中出现的“盲目发展”的问题<sup>[11]</sup>,并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于暑假前夕迅速调整了本市中、小学招生比例。在1953年上海市小学毕业生较1952年增加17.2%的情况下,上海市初中招生人数较1952年却减少了39.5%,而当年上海市高中招生规模虽与1952年持平,但由于初中毕业生较1952年有41.4%的增幅,仍有相当大的升学压力<sup>[12]4981-4982</sup>。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升学危机”,上海市教育部门以增招为思路,采取增加学校、扩大班级、增加名额等方法,以尽可能保证大多数学生顺利升学。与此同时,团市委、少先队等部门开展协作,利用报纸、电台等媒介在学生家长中间初步进行了端正升学思想的宣传与教育<sup>[10]</sup>。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进一步对中、小学进行整顿<sup>[8]239</sup>。

在“停止盲目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主要是高中)“应按需要与可能作适当的发展”的前提下<sup>[8]240-241</sup>,中共中央首先对于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重新进行了规划设计。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确定了“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还只能是一部分”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要求学校在平时教育中“不应片面强调学生毕业后如何升学”,而应该“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以此纠正学生中存在的歧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与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习惯<sup>[8]263</sup>。

该指示首次明确提出动员高小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这一要求,表明劳动教育由“虚”转“实”,从单纯的中学教育环节扩展到毕业生出路环节。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将作为高小毕业生出路的“劳动生产”明确为“农业生产”,将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视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助力,解决落榜小学生出路问题的“基本办法”<sup>[13]</sup>。

1953年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升学危机、高小学生的过剩这一实际问题,迫使学校层面的劳动教育从“道德”和“技术”层面走向生产动员,而动员的范围也从在校生延伸到毕业生。而从动员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到明确参加农业生产作为主要出路,这一微妙的变化则与1953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热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中央精神相适应,各地方也开始步调一致地展开宣传,从而开启了有关学生出路问题的第一次舆论转向。

## 二、从“升学第一”到“劳动光荣”

195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转发了教育部的指示,劳动教育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但这一过程起初并不顺利。对于上海大多数落榜生而言,最主要的出路还是“升学”。高小学生因为年幼,“怕考不取”“怕留在家”。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则抱着“考不进高中是失学”的观念。更多落榜生还是倾向于在家自学,等待时间再考试,而不愿参加劳动<sup>[14]</sup>。根据上海市教育局的统计,1953学年度全市高小落榜生中参加自学的有4310人,从事劳动的仅有1013人<sup>[15]</sup>。而截止到1953年底,上海市实际未升入高中学生人数5348人。其中已自行找到工作或离沪者仅247人,参加国防经济建设的有887人,最终仍有4214人暂无出路。在工作人员看来,大部分学生不愿意离开上海,就业热情也不高,这些都给他们的动员增加了难度。在动员的过程中“犹豫不决”“动摇不定”者不在少数,其中还不乏已经被录取而未报到,或临时变卦者<sup>[16]</sup>。

在劳动教育宣传初步展开而高小、初中落榜生逐渐累积的情况下,不仅动员落榜生参加生产难度较大,教育部门要完成升学任务也不是易事。1953年底,上海市教育局党组给市委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中,即对华东分配下来的中学招生任务表达了畏难情绪。在感到完成任务“非常吃力”后,该党组重申“劳动教育”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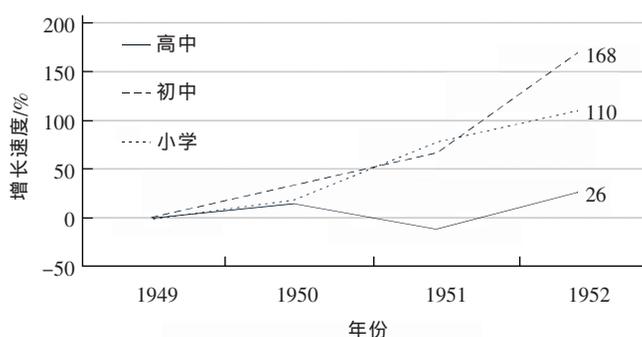


图1 1949—1952年全国中小学在校生增长速度示意图  
(1949年为基准年)

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初步确定了在初中毕业班中进行“毕业后有条件者参加劳动生产,不能参加生产者进行自学”的教育思路<sup>[17]</sup>。

除了教育部门、宣传部门在宣传动员过程中所遭遇的上述困难外,作为“接收方”的劳动生产部门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全国范围内动员高小毕业生参与农业生产有所不同,上海从执行“一五”计划开始,逐步明确了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两个基地”的定位,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量激增。进入工厂、参加生产也就自然成为落榜生的主要出路。各个工厂对于高小尤其是初中毕业生相对较为欢迎,认为他们有文化、学技术较快<sup>[8]288</sup>。但在新鲜感逐渐退去之后,工厂对于学生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学生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对于工厂环境和从事体力劳动尚缺乏实际体验的学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加以调试。与之相似,对于这些新工人的过高期待也使工厂方面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彼时上海工厂普遍开展的关于劳动纪律的教育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状况,青年团方面对于青工不佳表现的批评,也说明在劳动教育的思路下基层实践的多重面相<sup>[18-19]</sup>。

在上海出现的这种新工人之不适在全国并非孤立,来自东北的调查也显示了这一问题的普遍性。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新工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阶级”,高小初中毕业学生刚参加工厂工作就怕脏、怕累。有学生被分配到沈阳一工厂,转岗30多次,始终对工作安排不满意,最后还是跑掉了。大多数学生认为“集体性太大”“太不自由”“受不了”。而相较于高小毕业生,初中生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情绪。不少厂领导反映,初中生自以为是,不好好学技术,“不好领导”。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性客观存在,“劳心者治人”“升学第一”等观念积久而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不仅学生如此,“家长如此”“教师也如此”<sup>[8]288</sup>。本来升学不成进入工厂也是解决生计的一条出路,但作为1953年突如其来的升学危机的副产品,多方对这一变化均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心理适应,而劳动教育在基层的曲折实践才刚刚拉开序幕。

### 三、作为“经验”的劳动教育

在1953年劳动教育初步展开的基础上,1954年1月全国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以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学生”。会议要求各中学明确“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特别强调要在中学生中间加强劳动教育,并将其提升到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同的高度<sup>[8]316</sup>。与此同时,乘“反官僚主义”运动之风而出现的教育布局调整也伴随着运动的结束逐渐冷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教育部门妥善处理了1953年升学危机,最终使70%以上的小学毕业生、80%初中毕业生顺利升学<sup>[10]</sup>。对于更多的地方干部而言,1953年这一“关”过去了<sup>[8]331</sup>。正因为如此,1953年教育部出现了“上半年反冒进,下半年反保守”的现象<sup>[8]286</sup>。一方面,1953年升学危机被重新诠释,危机的出现被归咎于特别是“劳动教育”的缺失和宣传工作的偏差<sup>[8]298-299</sup>。另一方面,各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次危机的应对被认为是“取得相当大的成绩”<sup>[20]</sup>。而与之相应,危机过后,1954年招生计划制定的各项指标继续膨胀。在上海范围内,一度被压缩的初中、小学招生人数出现回弹(如图2<sup>[12]4980-4981</sup>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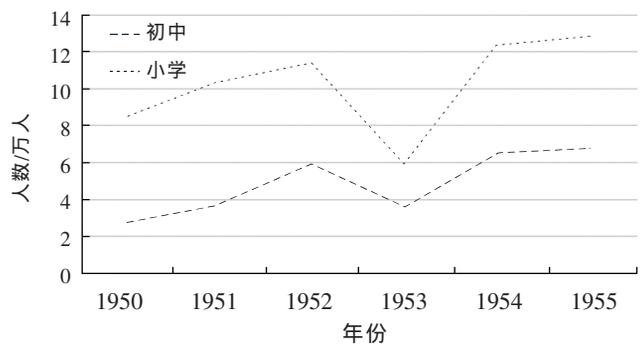


图2 1950—1954年上海市初中、小学招生人数趋势图

由于学生被视为可流动的人力资源,1953年升学危机从“教训”上升为一种“经验”。各部门在处理毕业生的问题上也就显得更加自信,即认为毕业生不怕多,多了可以分流和调控。在1954年教育计划的落实过程中,“初中、高小学生是少,不是多了”的观点应运而生。在“能多招一些学生就可以多招一点”的原则下,“加强劳动教育”也就成为解决“过剩”与“发展”矛盾的有效办法<sup>[8]289</sup>。

在研究了若干年内毕业生数字之后,教育部认为“今后不仅小学毕业生大部分不可能升学,就是初中毕业生也大部分不可能升学”<sup>[8]331</sup>。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相较于1953年主要在“高小”学生中进行生产动员,在1954年新一轮的劳动教育中初中毕业生也被选定为基本的动员对象。1954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在总结1953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在高小、初中生中间作好升学与生产的宣传教育工作<sup>[21]</sup>。1954年5月,中宣部专门发布《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将贯彻劳动教育之必要性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提纲明确将“劳动光荣”提升到中小学教育重要目的与任务的高度,重申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现实。进而要求各地在毕业生中间批判轻视体力劳动等错误思想<sup>[22]</sup>。一场在中宣部指导下,以高小、初中生为对象的劳动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场自上而下的宣传浪潮来到上海,不免携带有一些地方的特点。首先,曾被教育部点名的“1953年上海高小毕业生的吵闹事件”,就是由上海市初中毕业生“领头”闹起来的。因此早在应对1953年升学危机的过程中,上海市教育部门就已将本地初中毕业生作为劳动动员的主要对象<sup>[8][31]</sup>。其次,考虑自身的工业基地的定位和“一五”期间的实际任务,上海在开展劳动教育与生产动员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动员郊区学生参与农业生产、城市知识青年(尤其是初中学生)接受技术训练或进厂工作的分流策略,以期符合号召知识青年转型成为新型技术青工的宣传方针<sup>[23]</sup>。

“劳动光荣”是劳动教育宣传的主要口号之一。上海有关部门运用报纸、刊物、广播等各种工具,面向学生家长、社会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1954年5月,上海市各区以区委学校教育科为主,吸收区文教科、团区委学校工作部、区公安局文保科等单位成立“组织初中高小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联系会议工作组”,直接面向毕业生开展工作。该工作组在与产业单位接洽、对报名参加生产的毕业生审查的同时,重点在毕业生中开展教育动员。其动员的内容之一,即是培养学生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sup>[24]</sup>。

除此之外,上海市教育局还专门提出以补充教材来贯彻劳动教育的要求。要求教师将补充教材和语文课本联系起来,利用正面教材中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分析,使学生体会到劳动最有前途<sup>[25]</sup>。根据这一精神,中、小学教材内容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初中课本开始出现诸如《王永准》《筑路》等有劳动教育意义的作品。《王永准》一文以邢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原型,刻画了主人公不怕山区恶劣环境,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形象。《筑路》一文则选自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初中课本之所以节选这一部分,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们了解到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并促使初中学生积极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工作”之中<sup>[26]</sup>。

在教学材料改革之外,还有教学方式的调整。在学校内,教师以班级会、周会的形式进行口头教育。在学校外,学校的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学生参观工人新村、访问劳动模范,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于劳动、特别是对于工业生产的认识<sup>[27]</sup>。除了常规教育活动外,组织欣赏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小说等文艺作品也是一种“劳动教育”的方式,并且这种形式在学生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不少学校组织师生观看描写苏联培养青年技术工人的电影《走向生活》<sup>[28]</sup>。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卡嘉》中那个克服困难、积极进行发明创造的针织厂女工,也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sup>[29]</sup>。

在上海大张旗鼓地进行劳动教育并初见成效的同时,各方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不管是宣传者还是受众对于“劳动”与“升学”普遍存在模糊与左右摇摆的姿态,不仅地方干部表示宣传“劳动光荣”的尺度很难把握,不少教师在这一问题上亦表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个别学校还出现了老师将提问问题视为“拼命死钻问题”,称学生一心想升学,称之为“唯有读书高”的剥削意识在作祟,“应该好好批判一下”,在学校里只讲劳动光荣、不讲认真学习的重要性,批判“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时,某些平素肯刻苦钻研的同学发生了一种错觉和顾虑,已经在学习上发生了不敢钻研的情况<sup>[30-31]</sup>。有些教师过分强调劳动生产是学生毕业后“唯一的道路”,以至于在某些学生中产生了等待劳动生产而放弃学习的情况<sup>[32]</sup>。部分原本就不肯吃苦学习的学生,也滋生了不重视学习,放任自流的情绪。

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各地纠正宣传方面的偏向。上海市教育局也一再要求全市各中学进行自查与纠错<sup>[33]</sup>。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所出现的诸多问题开始在各地逐步得到缓解。一方面,教育局牵头,团市委、宣传部相互配合,在有意愿继续报考的落榜生中间组织自学,以此来平衡升学与劳动的矛盾<sup>[34-35]</sup>。另一方面,“劳动光荣”观念开始取代“升学第一”,相当一部分学生意识到毕业后有“生产”与“升学”两条出路可走了,而日趋复杂化的学生心态与社会舆论,也作为劳动教育的副产品继续发酵<sup>[36]</sup>。

从1954年开始,中央下达的明确指示与上海等地方的基层实践都标志着劳动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劳动教育向教学改革方面渗透,教科书的修改、教育方式的多样化都推动着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在高小、初中学生中间宣传“劳动光荣”以及动员落榜生参加劳动生产,也使得宣传战线教育战线、工业战线、农业战线真正实现了协同一致,从而为劳动教育步入常态化提供了多重保证。

#### 四、结语

在学术史的视野里,“劳动教育”至少应该在两个层面得到观照。它既是1949年后教育制度顶层设计的直观反映,也是教育等相关部门在特定时期应对现实需要的实践经验。建国初期,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层面具有道德、技术双重内涵,也直接服务于“为工农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教育目标。伴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推进,劳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相互磨合、彼此适应,并能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进行自我更新。

1953年教育部为平衡教育布局对小学、初中招生比例进行了压缩从而引发了升学危机。高小学生过剩这一实际问题,配合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作为应对这场危机的重要举措,1953年底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第一次关于学生出路的舆论转向,从而从实践层面揭开了劳动教育的序幕。

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妥善地解决了这次危机,确保了大多数毕业生顺利升学。而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现了一条可行的思路,即动员学生参加劳动生产。1953年升学危机也从教训变成解决毕业生出路问题的经验。从1954年起,高小、初中在校生数量在“过剩”与“继续发展”的矛盾中持续增长,而劳动教育被各方都视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重要方法。

从更宏观的角度讲,伴随着知识青年进厂,整个工厂的生态亦随之发生变化。这些“旧学生”“新工人”的出现,推动了工人队伍的新陈代谢,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产生了多方位的影响。在执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多个部门开展联动试图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推翻在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观念。塑造出一种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掌握了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既是工人、又是知识分子的“工人知识分子”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教育的贯彻与实践推动着一场人的革命,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 参考文献:

- [1] 程先英.对“新中国十七年劳动教育”的历史考察[D].湘潭:湘潭大学,2011.
- [2] 郑杰.新中国两次教育改革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比较研究[J].上海党史研究,1999(12):159-162.
- [3] 刘猛.劳动教育:从陶行知到毛泽东[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2):18-21,51.
- [4] 陈彤彤.建国以来劳动教育的历史演变与反思[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5.
- [5] 新华社记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N].人民日报,1949-09-30(2).
- [6]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J].人民教育,1950(1):10.
- [7] 关保英,杨博,许松,等.教育行政法典汇编1949—1965[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68.
- [8]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93,139,239-240,263,286-299,316,331.
- [9]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83,1001,1021.
- [10] 文汇报编辑部.上海小学和初中毕业生升学问题大部获解决[N].文汇报,1953-09-14(1).
- [11] 文汇报编辑部.批判教育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N].文汇报,1953-04-16(1).
- [12]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980-4982.
- [13] 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N].人民日报,1953-12-03(1).
- [14] 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向小学毕业生(少先队员)和初中毕业生进行宣传教育的意见[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3(A22-2-194).
- [15]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关于1952年度—1953年度各区小学毕业生升学、从事劳动生产及自学情况综合表[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B105-5-901-1).
- [16] 上海市教育局.本届初中毕业未升入高中学生情况总表[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3(B105-5-930-28).
- [17] 上海市教育局分党组.关于处理不能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问题的报告[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3(A22-2-194).
- [18] 解放日报编辑部.上海部分职工中劳动纪律松弛现象有所改进[N].解放日报,1953-07-16(1).
- [19] 杨小弟.我认识了生产为谁,今后决心遵守劳动纪律[N].解放日报,1953-07-16(2).
- [20] 人民日报编辑部.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N].人民日报,1954-01-03(3).
- [21] 人民日报编辑部.为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做好准备工作[N].人民日报,1954-04-19(1).
- [22] 人民日报编辑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N].人民日报,1954-05-29(1).

- [23] 张华英,李秀文,李秀莲,等.给全华东农村高小毕业生的信[N].青年报,1954-05-11(2).
- [24] 上海市组织初中高小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联系会议工作组.上海市组织初中、高小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联系会议工作组的工作简报[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B105-5-1042-1).
- [25] 上海市教育局.怎样通过语文课中的补充教材来贯彻劳动教育[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B105-5-997-1).
- [26] 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材中心.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6册教学参考提纲(初稿)上分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19.
- [27] 文汇报编辑部.虹口中学积极进行思想教育[N].文汇报,1954-06-17(3).
- [28] 张逸.从影片“走向生活”里学习什么? [N].文汇报,1954-06-09(8).
- [29] 小羊.在生产中学习成功的榜样——介绍影片《幸福之途》和《卡嘉》[N].青年报,1953-04-14(4).
- [30] 一权.“刻苦钻研”和“唯有读书高”思想有无共同之处? [N].文汇报,1954-6-10(6).
- [31] 青年团华东工委.关于协助党动员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及自学的报告[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A71-1-702).
- [32]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处理本市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问题的情况及意见报告[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A6-2-25-124).
- [33] 上海市教育局.关于请及时纠正毕业生在进行劳动生产教育中的偏向问题的通知[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B105-5-1242-33).
- [3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新成区组织上届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组织自学的试点工作报告[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A6-2-25-124).
- [35]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处理本市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问题的情况及意见报告[Z].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54(A6-2-25-124).
- [36] 文汇报编辑部.结合群众的实际思想情况进一步开展劳动教育的宣传工作[N].文汇报,1954-08-06(3).

## The Rise of PRC Labor Education and Grass-roots Practice in Shanghai

LIU Yaj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quickly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disequilibrium 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was also expos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properly handled the “1953 enrolment crisis”. After the crisis, the lessons became experienc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i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rplus”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inued surplus of graduate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No matter at the national level or in Shanghai, the range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was expanding. Labor education became normalize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Key words:** earl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Shanghai Education Bureau; the 1953 enrolment crisis;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责任编辑:箫姚]